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工人日报文化周刊
《资治文摘》杂志社 合办

母亲的“顺口溜”

母亲是地道的农家妇女,没有多少文化。在我的记忆里,生性温柔寡言的母亲每天只会默默地家里家外操劳着。即使再累,母亲的脸上也总是挂满笑容。

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发生了和同学打架的事件,让我终于第一次见识了母亲大发雷霆的样子。让我从此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是,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母亲,肚子里竟然藏着那么多的“顺口溜”。

那天,因为同学叫我“黑蛋儿”,我动了手,把那位同学的脸抓得不成样子。同学的家长找到我家“兴师问罪”。母亲只是可着劲儿地一边给人家赔不是,一边数落我。当同学的家长带着发泄后的快意,提着母亲“送”的十多个鸡蛋离开我家后。母亲拉过我,暴跳如雷地咆哮着。扫帚狠狠地打在我的屁股上。

晚上睡觉时,母亲端来了热水,用毛巾轻轻擦拭着我红肿的屁股。“儿啊,不是娘心狠,娘是想让你知道‘忍一时气,免百日忧’这个理儿啊!”那天晚上,娘给我讲了很多“顺口溜”。娘眼里闪烁着的,也满是泪花儿。

所有的委屈,在母亲的那些“顺口溜”和泪花儿中瞬间变成了深深的自责。我想,母亲以前之所以很少对我说起那些“顺口溜”,大概是因为我年龄太小的缘故吧。后来的生活中,每当我贪玩时,母亲总会及时地提醒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生七十古来稀,问君能有几春秋?”;每当我乱花钱时,母亲总会告诫我,“成由勤俭败由奢”,“发家如同针挑土,败家如同浪打沙”;每当我与同学闹别扭时,母亲也总会教育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这样,在母亲那些温暖的“顺口溜”和亲情的滋润中,我一路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知晓母亲当年对我讲的那些“顺口溜”出自《增广贤文》,是读初中二年级的事儿。那年,我担任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一次交作业本时,我无意中发现了老师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增广贤文》。我便好奇地翻看起来,那些母亲常曾对我经常讲起的“顺口溜”一句句地赫然跃进了我的眼帘。那一刻,年幼时曾看到的情景便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

多少个夜晚,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坐在那儿认真地翻查着字典;又有多少个清晨,做饭的母亲总会嘴里叨叨着那些我当时听不懂的“顺口溜”。这些,我早已无从记起。但我今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母亲当年对我所讲的那些“顺口溜”。因为,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个她深深爱着的儿子。

湖北省枣阳市姚岗镇中学 吴强

“潜规则”图书误人子弟

韩导勤

日前,笔者从媒体惊闻:时下在江西南昌市的图书市场上,一些宣扬“潜规则”的书籍堂而皇之地摆上了书架。这些图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教人如何奉迎恭维、投机取巧以及送礼的技法等。诸如,《做人不能太“老实”》、《送礼三十六计》等等。

据悉,有本名为《说话说得滴水不漏办事办得恰到好处》的书中如是写道:“要想在办事、求人时顺利,须尽快地养成恭维别人的习惯。当恭维别人已经变成你的习惯时,你办事的能力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试想,“当恭维别人已经变成你的习惯时”,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呢?毋庸说,这个人早已成了一个唯唯诺诺、低头哈腰、世故圆滑、投机钻营、是非不分、“OKOK”、摇尾乞怜的“机器人”了!再如《送礼三十六计》,甚至被某些人誉为是一本送礼“技巧”的“工具书”!殊不知送礼和行贿历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少浏览过这本书的有识之士认为,“潜规则”图书宣扬的庸俗价值观严重偏离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诚实守信、公平公开公正的精神以及社会主义的荣誉观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切不可让这类不良图书招摇过市,贻害群众。

令人堪忧的是,这类“潜规则”图书对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急于为自己社会阅历“充电”的大学生来说,最具诱惑力和杀伤力,因而危害尤甚。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从源头上清除这类“潜规则”图书的危害,愚者管见,除了要严厉打击各种盗版图书和非法出版物,同时还要进一步规范正版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从当前许多地方图书市场上出现这类“潜规则”图书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不少竟是堂而皇之地摆上书架的正版书,可见这类图书并非都是盗版,其中不乏钻了正规渠道的空子。我们不妨借鉴“问责制”,认真查查这类图书究竟是怎么出笼的。相信有我们各地新闻出版、文化市场管理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和严格把关,这类污染人们心灵、误人子弟的不良图书一定能得到及时的清除,从而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创造更健康的阅读环境和氛围。

名家自传的“口红化”

刘效仁

名家自传,早就成了圈儿内的寻常风景。利用自传,表扬与自我表扬,就像靓女们把唇儿涂得艳红,亦算是传家的潜规则了,即使王蒙,也莫能例外。评论家李建军就曾在报上撰文,对《王蒙自传》的“口红化”直言批评。不妨抄录如下:写到自己“才华横溢”的时候,踌躇满志,简直到了飘飘欲仙、忘乎所以的陶醉境地:“我即使渺小软弱,仍然富足、丰盈、旺盛、通灵、透亮。文学的火焰,知识与才华的火焰呼呼燃烧,瞬息万变,千姿百态。用一位好朋友的话来说,浑身带电,到处放着火花。”如此无遮无拦的自吹自擂,如此天花乱坠的自赞自诩,足以让李白羞愧,让曹植自卑。

在另一部自传《九命七羊》的第13章,王蒙还连篇累牍地用自己惯用的泛滥而夸饰的言语来贬抑别人、美化自己:“……我必须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规格、品格……我必须以我的快乐光明的样板形象来回答愤怒阴暗的您老。我必须用宽阔通达的样板世界来比衬您的鼠肚鸡肠。我必须用专心用功、源源不断的文学劳作来回应吾兄的笔枯文涩江郎才尽。”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王蒙的三部自传读一读,或许会与李建军有同感。我想说的是,用自传标榜自己而贬低他人的行为,绝非王蒙一人所为。甚至可以说,这早已是一种普通现象,所不同的只是其程度强弱,态度明朗与隐讳,篇幅的长短,语气的强烈与和缓有所差别而已。事实上,正如李建军所论,“由于人生来就有一种渴望得到别人认同和赞赏的心理需要,所以,人们在写自传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天下诸美皆归之于己,将世间诸恶皆归之于人;就有可能把自己写成佛,把别人写成魔;等而下之者,则拿自传当做泄愤的工具,雪耻的利器。”如何将人性的劣根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正如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一样。如何将这种自炫自夸、贬人损他的自传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得到有益的矫正和修复,如何让实事求是成为名家自传的一条铁律,如何使其不至于陷入“口红”化而不能自拔,又如何使其不良企图难以得逞并影响广大的阅读者,我思来想去,深感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或寄望于传家的道德自省和职业操守,这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胡耀邦称自己一生有两件事难以原谅自己:一是1959年批判彭老总,明知彭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二是1968年匆匆被解放出来参加中央全会,一看到说刘少奇是“内奸”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知道是不可能的,仍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华君武也曾坦言:反右时画漫画讽刺过胡风等一些被冤枉的同志,无非是想表现自己的积极、进步,应该说是有私心的,好像很聪明,其实很蠢。而真正能如胡耀邦、巴金、韦君宜们勇于说真话,像鲁迅先生那样解剖自己胜过解剖他人的人并不多见。更多的则会像王蒙那样,立志把自己写成一个“吾心光明”的“正面形象”。

或将把关的责任全权交给编辑、出版家,这同样靠不住。不是说编辑、出版家缺乏慧眼,事实上,他们对于传家的自我表扬也心知肚明。也不仅是缺乏胆识,缺乏审阅删除的勇气,缺乏去伪存真的真诚,更因为一些出版家早就变成了出版商,唯名是崇,唯利是图,早把名家视为牟取暴利、赚足眼球和提升收订率的工具和筹码。结果,自是乐观其成,乐于效劳,乐于成名家自传“口红化”之“美”。所以,名家之传普遍成了王蒙式的自吹自擂。“缺乏春天般的温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自我,却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李建军语)”

或曰公道自在人心,把甄别阐解权交给读者,这显然勉为其难。最大的难点在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比如说,绝大多数的自传是名家的自说自话,并无所贬所损对立面的任何著述任何自辩可资参考对照,更难以做到如鲁迅所提倡的那样,“美恶一并写出”,以至于读者只能陷于被蒙蔽的事实之中,被传主牵着鼻子走。再加上许多读者的崇名心理,总以名家之是非为是非,又习惯于囫囵吞枣,这便为自传家的欺世盗名铺平了道路。

《推拿》:用闪电宽恕黑暗

庞余亮

人体内部一片黑暗。惟有骨骼,是黑暗身体中的闪电。最与闪电酷似的,是我们的脊背。

可谁能看清自己的脊背?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平庸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生活的斗志在什么地方?尖锐的思想在什么地方?魂不守舍的生活啊。脖子只有180度的自由,我们只能看见前胸,不能看清自己的背部。但毕飞宇新作《推拿》中的“那群人”能看清——他们就默默站在我们最不设防的背部,等待我们转过身来。

他们是一群在黑暗中挤靠在一起相互取暖的人。王大夫和小孔,小孔和小马,金嫣和泰来,沙复明和都红。对于盲人推拿师来说,黑暗是现实的,暖和也是可能的。他们拥抱在时代的大码头上。有人在归来,有人在出发。归来者无法偿还,而出发者永远犹豫。比如,在爱之间摇摆的小孔,在欲之间摇摆的小马,被美唤醒的沙复明,对婚礼无限向往的金嫣。每个人都得选择。滔滔的流水对于盲人们尤其急促,在急促之中,就可能推按错了别人的脊背。

现在,他们的手就放在我们最危险的地带。他们长在手指上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疲倦、衰老和扭曲的脊梁,也窥见了我们所有的伤痛和隐私。他们的推拿,比饥饿之鹰更为准确。比如,王大夫的绝招是,捂住你的屁股蛋子,晃一晃,纲举目张,我们的伪装就散了架。

题材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泥沼。盲人题材更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泥沼。可对于自信的毕飞宇来说,他出色地完成了一次自我挑战。整部小说枝蔓相连,群像的力量连成了一个小世界。那些在黑暗的门槛前的叹息,那些在深渊中积聚的温暖,其实就是另一群我们。黑暗拒绝闪电,而有情有义的闪电则通过毕飞宇的文字宽恕了黑暗。这个世界,并没有盲人和明眼人之分。毕飞宇用《推拿》向生活在鸦片文化中的我们发出了邀请,他用“人”字对我们进行了纠正,谁有勇气和“他们”对视?!

帕慕克说:“写作就是把内心的自省转化为文字,就是退隐到自己的世界并研究自己进入的这个世界,就是耐心地、执着且快乐地做这件事。”在《青衣》、《玉米》和《平原》中,毕飞宇如此耐心地、执着地、快乐地和笔下的人物对视,他尊重他们。

在《推拿》中,毕飞宇延续了一贯的对“人”的着重,还呈现出他对生活最为强大的包容力。有了这强大的包容力,《推拿》显示出抑制不住的勃勃生机。那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力量。在“那群人”的世界里,每一次和现实的碰撞都是闪电。闪电在盲人世界里运行。每一个盲人,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有注定被照亮的那一刻。小说家就是在寻找被照亮的那一刻。

请小心长篇小说《推拿》中的闪电,被闪电照亮过的世界和没有照亮过的世界肯定不一样了。闪电宽恕过大地,大地会充满了硫磺般难言的恩情。文学真正的力量,就是把闪电作为种子,化为心灵淤泥中的藕鞭。当我们合上书本,汹涌的闪电已化作满目的荷花。

郭敬明:《小时代》中大转型

李鹏

由青春文学代表作家郭敬明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小时代》1.0第一季《折纸时代》,近日在北京举行了新书发布仪式。

记录“80~90后”鸟巢一代心灵成长史的《小时代》,其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浮躁繁荣的上海为背景,记述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趴在被窝里的小人物”。小说写了他们从高中、大学、择业及恋爱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是一部对当下“80后”、“90后”生活的真实写照。郭敬明在《小时代》创作手记《一个时代的终结》里写道:《小时代》第一季,其实只是一个开场,它塑造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这个飞速发展的锋利社会。物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足够压垮很多一直以来人们心中存在的美好和善良。这也是我希望在这个小说里展示和探讨的问题。

郭敬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像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描绘巴黎物欲社会那样,用自己的笔,自然地贯穿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中间。通过书中的18个人物、十几条线索,跌宕起伏、从容不乱地记录房价、地标、豪华汽车和进口香水,菲佣、名包和公司并购等,进而将当代青少年、大学生,甚至都市白领的生活和情感用全新的叙述风格和细微的笔触娓娓道来。和读者一起对整个时代进行观察和思考:我们“得到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

“上个世纪30年代工人革命运动的大时代能够诞生茅盾先生的大作《子夜》,”文艺评论家张颐武说,“相对来讲,今天这个平静、持续发展的‘小时代’能够出现《小时代》这样关注小人物杯水风波后内心的微妙感受的、超越悲情的浮世绘式作品,能够完成从个人到人类的感受体验,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人生思考,感受这个时代的气氛和力量,即使是小的,也会是美好的。这是鸟巢一代的生活画像。”

《小时代》的选题策划人金丽红说:郭敬明这两年的生活经历是该书构思的直接来源。他在文字的华丽中体现出的激情和唯美,延续了以前的风格。但是,他在视野的宽阔性和话题的永恒性上有着质的飞跃,不再是一个主角决定故事走向的结构,不再拘泥于青春校园里的爱情。

据悉,《小时代》第二季《青木时代》将在12月的《最小说》上刊登。《小时代》将效仿美剧的创作方式,每年推出一本,计划创作5年,根据读者反馈调整创作计划。

书籍的置换

小 蜩

不知不觉当中,这些年来自己书柜里的书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还在持续。越来越多的“新书”被清出去,更多的古旧书籍被迎进来。原来它们中大多数的年龄不过是二三十年而已,而今却有许多变成了耄耋老人。这一切都是由我个人的兴趣的递进而发生变化的,因为年青时即喜藏书,虽亦偏重古旧典籍,但几十年下来还是以新书为主,真正的古旧典籍实在得之不易,所以柜中所藏多为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书籍。虽也不乏“文革”前的出版物,但毕竟少得可怜。

一般来讲,个人的藏书历史是由其年纪以及家庭渊源而决定的,所以侨辈如我者其资历自然浅得很,藏书中很少有半个世纪以上的“长者”。这是我对自己的收藏最不满意之处,“穷则思变”,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书籍置换”,而且幸运的是及时赶上了孔夫子旧书网这趟“快车”,使“书籍置换”加快了速度。

旧书可以帮助人们追回过去的年代,从这层意义上讲其作用同其它文物相同,古旧书籍同样可以引发人们的“思古幽情”。也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特殊的作用,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乐此不疲。藏书者终年省吃俭用孜孜以求图得是什么?还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

以我个人贫薄的收藏知识来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种类的书籍是众望所归:首先是包括民国前线装和洋装在内的古籍;其次是新文学类书籍(包括译著);然后是“文革”前的书籍;最后才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东西;而这个时期以后的出版物,大概只有使用者搜集而基本上没有收藏者问津。这几类书籍,不用说线装古籍价值最高,新文学书籍紧随其后。现在孔网上的旧书拍卖也当属这两种书抢得最火。宋版明刻您想都不要想,就是民国以前的线装书动辄也要上千甚至几千上万元。新文学的书籍以品相及是否精装为贵贱的依据,一般名头大且品相在八品以上的书籍价格总得在二三百元以上。“文革”前的出版物近些年来的行情见长,而且可以断定其价格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难怪董桥说过这样的话:“1949年到‘文革’以前,大陆陆陆续续出版了很多文学书籍,当时一般人当然不觉得那些书都应该买下来存起来。后来国策不同了,出书的趣味也不同了,很多书都不再这样印行了。于是,香港今天旧书肆偶然摆出的‘文革’以前的旧版书,价钱高得有点不像话。”(《关于藏书》)董桥讨论的是书籍的价格问题,当然也包含书籍出版的总体走向。过去的书籍为什么能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还不是因为它们保持了过去的时代气息——那种高雅庄重朴素大方的风度气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代读书人对现实出版业媚俗倾向一种深恶痛绝的心理。经济发展了,人心浮躁了,失掉了从前那种文化的根基,出版物当然要“今不如昔”。试看现在的出版社有几家不考虑销售市场?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消费者的欣赏品味?这当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样下去“高雅”、“古朴”、“庄重”的文化气息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想得到一部经年的旧籍,总要首先顾全它的大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将它收入自己的柜中箧内。如果将各种细节考虑得太多,就会因小失大。比如,有的书友在购书时总是提出许多问题,诸如:是否馆藏?是否有笔迹划痕?是否“一版一印”?是否这?是否那?瞻前顾后委委缩缩,生怕吃亏上当。这样下去肯定得不到好书。网上拍卖的旧书,都是有扫描的图片,根据这些图片你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怕吃亏虽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总不能寒蝉若禁因小失大。在交往中找到几家信誉好的店主,一路追杀下去总可以购进些自己中意的书籍。

过去我是“单向”购书者,每年从孔网上买下许多古旧书籍,津津乐道沾沾自喜。但时间长了发现自己的经济实力毕竟有限,这才学会了在网上卖书。将自己淘汰的书籍拿出去拍卖,再将所得之资再投入所需书籍的竞拍之中,这样不但可以大大减轻经济上的压力,使所得书籍的质量和数量均可逐步提高,而且还可以合理地安排书柜的空间,真是其乐无穷的一件益事。

一周书情

在近日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文学话题”研讨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用一系列“残酷”的数据,说明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在当前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他说:“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概超过1200部,差不多一天能出3部。但事实上,只有不到一半的长篇小说能进入市场流通;另外一半,说好听点叫自娱自乐,说不好听就是‘造纸’后迅速变成了垃圾。”

据了解,在目前的图书领域,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在为单本图书发行超过一万册而奋斗、而发愁。根据今年上半年零售市场的监测数据,前200名畅销书中,为人所知的文学书只有20种。受众越来越少,市场越来越小。这应该引起文学界的反省。

惟一征得杨绛同意的杨绛传记《听杨绛谈往事》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作者吴学昭与钱钟书、杨绛为通家之好,其父为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是钱钟书和杨绛清华大学时代的老师。据说,吴学昭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杨绛对谈,记录了自杨绛出生至98岁的经历。

因《干校六记》、《我们仨》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的杨绛先生,刚刚出版了她的新著《走到人生边上》。不过,自己写与别人写毕竟角度不同。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称,该书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已经对《金庸全集》修改过三次的金庸先生,最近又决定作第四次修改,遭到了研究者的反对。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林保淳博士说,他和很多金庸研究者都对此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金庸小说从1980年开始定版,到现在2008年,已有28年的历史了,很多读者对金庸文本已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认知。现在,作者突然把前后作了一个大翻转,尤其是里面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比方说加入的黄药师和梅超风的感情,就摧毁了读者对东邪的印象。金庸是否有权力来破坏这些老读者的认知?“在这点上面我不是很认同,以一个读者的立场来讲,我仍然喜欢原来我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那一个空间、那里面的人物。”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先生认为,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肯定越改越好,文学作品不是这样的,可能第一次写出来的最好。

由著名作家张正隆著、真实记述东北野战军从东北入关南下直到解放海南岛征战历程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枪杆子:1949》近日出版。

这部作品共50万字,描述了毛泽东、林彪、蒋介石、傅作义、白崇禧等风云人物,再现了解放战争国共高层决策和对决的全过程,对指挥者的战略思想、战术、个性都有深入细致的客观描述。全书由《“狗皮帽子”进关了!》、《虎啸津门》、《北平和平》、《南下——难下》、《跨海之战》等27章组成。书中还原了众多尚未披露的战争史实,写作手法有新的尝试。

张正隆以擅长军事历史题材而蜚声文坛,他用了近15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记录当年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以及那场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肖一)

启动灾区学生读书援助计划

人民出版社捐赠《中华少年强》

本报讯 10月9日,人民出版社“灾区学生读书援助行动暨《中华少年强》捐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灾区的老师和孩子们在现场接受了图书捐赠。

《中华少年强》依据“抗震救灾小英雄评选”活动评选结果,集结了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少年英雄的事迹,由“英勇无畏篇”、“意志磨砺篇”、“乐观进取篇”、“大爱无疆篇”和“民族团结篇”五个部分组成,刻画了英雄少年们在大灾来临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顽强,以及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为支持帮助灾区人民,人民出版社启动了“灾区学生读书援助计划”,并将《中华少年强》一书的全部利润捐出。

《中华长江文化大系》在武汉问世

本报讯 (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刘国山)由中国长航集团组织200多个发掘与研究长江文化的专家、学者,耗时11年撰写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近日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和武汉出版社联合审定出版。《大系》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工程,拥有8编64卷,2000多万字,6000余幅珍贵图片,时间跨度5000年,地域涵盖整个长江流域。内容包括:山高水长: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物华天宝:长江流域的自然蕴藏与人文发掘;胜景佳迹:长江流域的名胜古迹与文化遗存等八个方面。

讲述老字号传奇故事

都梁推出长篇小说《荣宝斋》

本报讯 (记者赵亦冬)曾因《亮剑》、《血色浪漫》和《狼烟北平》三部作品蜚声文坛的作家都梁,新近推出了第四部长篇小说《荣宝斋》。

这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40余万字的作品,讲述了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的传奇故事和兴衰史。小说从一爿老店、两幅字画、三代同堂起笔,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荣宝斋的百年往事,描绘了老北京琉璃厂一带上至权贵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层人的生活——荣宝斋因经营不善或战事频繁几度濒临破产,但东家知人善任,掌柜兢兢业业,几度力挽狂澜,摆脱困境,使荣宝斋的经营蒸蒸日上。除荣宝斋的几代东家和掌柜外,琉璃厂一带整日遛鸟逗虫的八旗子弟、江湖上赶马帮的绿林好汉、远赴中国的俄国绅士、传说中的江洋大盗,以及王国维、张大千、罗振玉、汪精卫等历史名人也在小说中出现。小说还揉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古玩字画的文化常识和老北京的吃喝玩乐、民俗情趣,既是老字号的经营史,又是老北京的风俗画。

在10月8日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上,都梁称是一位荣宝斋的后人为他讲述了这个百年老字号的故事,让他萌发了写作的冲动。为写这部书,他做了大量的考证,“那么多行家看着,不能出笑话。”有记者问,这部作品与《大宅门》相比,有什么不同。他说,《大宅门》是家族戏,而《荣宝斋》的人物很单薄,整个作品是散点式描写,侧重老字号的兴衰历史。

该书的选题策划者金丽红女士认为,老字号背后有太多的故事,但人们知之甚少,都梁的这部《荣宝斋》为中国的民族品牌、老字号立传,有一种功德意义。